

Never
Forget

风干的记忆

——中关村「特楼」内的
故事

边
东
子

科苑撷英

上海教育出版社



Never
Forget

风干的记忆

——中关村「特楼」内的
故事

科苑撷英

上海教育出版社

边东子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干的记忆: 中关村“特楼”内的故事 / 边东子编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5444-1524-8

I. 风... II. 边... III. 科学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7249号

“科苑撷英”丛书

风干的记忆

——中关村“特楼”内的故事

边东子 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2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本

ISBN 978-7-5444-1524-8/G·1236 定价: 25.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边东子，浙江诸暨人。上过学，下过乡，当过教师。曾任科普编辑、文学编辑、音像编辑。后转入创作，涉及面广泛：小说，广播剧、传记文学、散文、童话等。获奖作品有：长篇小说《神厨传奇》，广播剧《世纪之声》（合作）、《山魂》、《妈妈，对不起》、《包起帆》等。近年来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创作方向，尤以科学家传记为主。

内容

提要

在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核心地带，林立的大厦遮掩着三座陈旧低矮的楼房。这三座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当时被称为“特楼”。这里曾经居住过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赵九章、王淦昌、郭永怀、杨嘉墀、汪德昭，等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授予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就有6位曾居住在这里，而“两弹一星”的三位挂帅人物：钱学森、钱三强、赵九章，都曾在这里生活、工作过。此外，中国现代科学的许多奠基人、开拓者，一代宗师如赵忠尧、秉志、贝时璋、童第周等，也是这里的住户。当作者轻轻撩开了历史的面纱，淡淡的香墨溶化了风干的记忆，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他们的可敬、可爱，认识到他们在中国科技、教育，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本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耐人寻味的笔触介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名人聚集的中关村“特楼”

(代序)

“中关村”已经成了今日高科技的象征、投资者的热土，也成了全球经济界关注的焦点。

在这里，一座比一座风格更加超前的大厦突兀而起。虽然马路越拓越宽，但塞车似乎是一道永远割不断的风景线。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性大公司的 **LOGO** 以及各类高新技术产品的广告纷纷挤进这里，奇幻迷人。

在这里，有“联想”、“方正”、“同方”、“新浪”等中国一流的高科技企业。许多世界级名牌大企业都在这里抢市场、抢人才、抢商机。被冠以“IT精英”、“知识英雄”、“知本家”的著名科技企业家，大多在这里掘到了第一桶金，为日后的辉煌打下了基础。

中关村也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人到这里来圆梦——就业梦、创业梦、发财梦，以及种种灰姑娘的梦、青蛙变王子的梦。

不必讳言，这里也有靠炒作 **CPU** 和内存条发家的暴发户；有开着大奔驰去银行贷款，却开着小奥拓去交税的“精明老板”；有善于“**Remake**”（造假）的奸商和屡禁不绝的盗版光盘小贩。

“中关村”犹如一尊千面造像，不同的视角可发现不同的“中关村”。



中关村夜景

当人们目光如炬地盯着中关村地皮的价格时；当“电脑玩家”们关心着在摩尔定律掌控下，CPU 的速度又提高了几倍，价格又降低了多少时；当各类媒体津津乐道地传播着中关村近似神话的“致富经”时；当学者们津津有味地考证着“中关村村址”和“中关村核心地带”究竟在哪里时，是不是也应当探讨一下，中关村最宝贵的是什么？

中关村最宝贵的，当然不是那些浮艳有余内涵不足的大型商厦，更不是那些暴发户、奸商和假冒伪劣产品，它们只是中关村施得太浓的脂粉和早晚要去除的痼疽；中关村最宝贵的甚至也不是地皮和楼盘，不是名声赫赫的大公司和那些“有品牌效应”的“高科技产品”。



中关村成了投资者的热土

中关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当年曾有一批把知识、智慧,乃至生命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科学家,他们才是中关村的“根”,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为此,我们要追溯到稍微有些遥远的 20 世纪 50 年代……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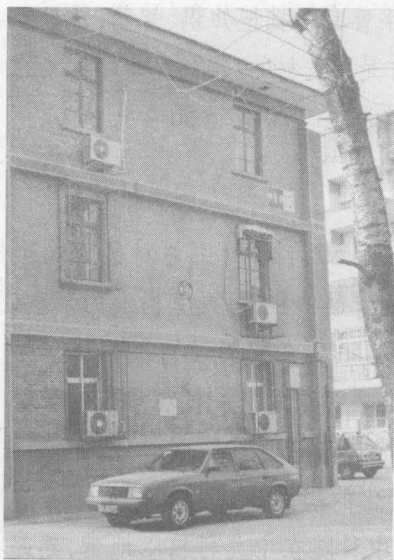
现在的中关村早已不像个村了,而 50 年前的中关村又太像个“村”了,路边有飞着蝴蝶的菜地、鸣着蛙鼓的稻田、野兔出没的草丛、藏着断碑荒冢的松林。

当年,就在这样的“村”中,中国科学院建起了一批现代化的科研大楼,以及一排排灰色的三四层的住宅楼。以现在的眼光看,它们确实简陋,可在那个时代倒意味着现代化的宏图正在展露。为了安置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和著名科学家,中科院在中关村核心地带,建起了三座“高研楼”,编号是“13”、“14”、“15”。当时,它们被称为“特级楼”(此外,还有“甲级楼”、“乙级楼”等称号),俗称为“特楼”。

在这三栋素面朝天的灰色楼房中,曾经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赵九章、杨嘉墀、赵忠尧、张文裕、童第周、邓叔群、秉志、尹



13 楼外景



13 楼东侧

赞勋、吕叔湘、顾准……我国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人文科学诸领域第一流的大家。在 23 位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就有 6 位曾在这里居住；首倡“863”高科技计划的四名科学家中，有两位也曾在这里居住。直到现在，百岁寿星贝时璋院士仍住在这里；何泽慧院士、李佩教授也还在守护着她们曾经的那个家。

如果去细细寻觅一番，我们会发现这里的主人公中竟有那么多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可惊可叹的故事，是值得镌刻在中国科技发展里程碑上的宏伟诗篇，也是一曲曲传之久远的壮丽颂歌。在中国，恐怕很难再找到“含金量”这样高，名人“密集度”如此之大的建筑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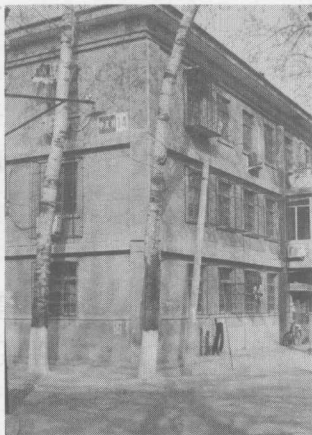
解放初期，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迫切问题就是求发展。被连年战火严重毁坏，本来就很薄弱的工业要发展；刚刚经过土地改革的洗礼，仍处于小农经济状态的农业要发展；在文盲充斥的国度里，显得单薄无力的国民教育要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犹如一根神奇的杠杆，必须用它撬动旧中国在岁月的风雨中已经被锈死了的车轮，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第一推动力。但是，这根杠杆需要一个支点。

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基本是由旧中国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所属的一些研究所组成。不仅人员少、设备差，而且学科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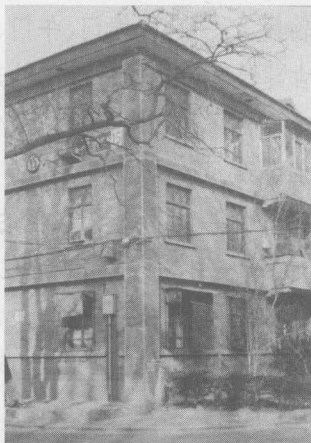


14 楼外景

重不全,除了地质、气象、生物等学科有一点老底子外,新兴的科学,尤其是当时被称为“尖端科学”的原子能、电子学、自动化等,基本是一片空白。要开发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人才奇缺是首要矛盾。但是,没有梧桐树,怎能栖凤凰;没有能够安放仪器设备,让科学家可以潜心工作的现代化研究机构,即使有了人才也没有施展的余地。因此,中国科学院最紧迫的一项任务,就是要选择一个有足够发展余地的空间,当时叫做“永久地址”。那时的中科院领导都曾为此事操心费



14 楼西侧



15 楼西侧



当年的15楼的楼号牌仍在



还是当年的木窗

力过。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当时的党组书记张稼夫和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竺可桢，都曾亲自带人实地踏勘。时任中科院副秘书长的钱三强和分管基建的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陈宗器更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梁思成是当时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经过深思熟虑后，他拿出一个方案：把科学院新址选在黄寺一带，这里正处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前门、端门、午门、故宫三大殿、景山万春亭和钟鼓楼等重要古建筑和新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天安门都在这条线上。梁思成素来重视保护北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建筑。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条金线，只有最重要、最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才可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多年后，张稼夫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幽默地说，梁思成的方案好似建“魁星阁”。“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星，是中国民间传说中专司点状元的神。他单足立于鳌头之上，一手持斗，一手执笔，寓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供奉魁星的场所自然就成了“魁星阁”。旧时，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魁星阁”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被建在显要的位置，以示对文化和人才的重视。梁思成当然不会真

的把科学院当成魁星阁,但是他肯定希望新中国重视科学,希望中国的科学有一天能在世界上“独占鳌头”。这就是梁思成要把科学院新址选择在中轴线上的良苦用心。梁思成的选址方案立刻得到了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批准。彭真当然明白立于中轴线上的建筑会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影响。这也说明新中国领导人对科学何等重视。

应当说,梁思成的方案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如果能够实现,那么我们今天站在景山的万春亭,沿中轴线向北眺望,就会看到一片金瓦红墙的建筑群,人们会指着它们说:“看,那就是中国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可惜,当时新中国家底太薄,经过实地勘察和测算,发现在黄寺建新址需要的资金量实在是太多了。对于急迫地要发展壮大的中国科学院来说,施工量太大,工期必然会拖得很长,而那时的口号是“要和时间赛跑”,形势不允许科学院为建院花这么多的时间。几经调研,反复斟酌,最后才选定了现在的中关村地区。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交通条件和电力条件,使基本建设和以后的科研工作迅速走上轨道。更重要的是这里靠近北大、清华和正在建设的“八大学院”,人才济济,是个“聚人气”的地方,吸引人才,搞学术交流都很方便,设施也相对完善,很容易形成一个科学中心。这个方案报到中央,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具体落实还要通过北京市。北京市政府毫不吝啬,将大泥湾(黄庄附近)以北、成府以南的4500亩地一并划给了科学院。

1951年底,中国科学院首先在保福寺北侧开始建设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大楼,近代物理所就是后来的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标志,这个当时被人们称为“科学城”,现在则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便开始崛起。为了建好这块科研基地,中国科学院还特别成立了一个“建筑委员会”,三位副院长吴有训、竺可桢、陶孟和分别任正副主席,委员由严济慈、梁思成、张开济等二十余人担任,钱三强、曹日昌任秘书。可谓阵容强大,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

(三)

现在,“中关村”三个字几乎就是“高科技”的标志,更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关村热”的推动下,近年来,考查中关村文化和历史逐渐形成潮流。仅仅关于中关村的来历就有不下五种版本:一说,这里原本是永定河的故道,有一个河湾,河边的村子叫“中湾村”,即后来的“中关村”;二说,慈禧老佛爷前往颐和园,中途要在这里休息,因此叫“中关村”;三说,“中官”即“忠官”,这里是埋葬“忠官”(即“忠臣”)的地方;四说,清朝有一个大太监死后葬在这里,太监又叫“中官”,这里便叫“中官坟”,因为“坟”太难听,便改叫了“村”;五说,清朝官员要到颐和园见“老佛爷”,因那时交通不便,只能在中途宿夜,第二天再赶到颐和园去,而“中官”即是官员们中途下榻之处。

但是,以上种种说法或缺少文字记载,或缺乏田野考察的实证,或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关于“中关村”的来历,地理研究所的丘宝剑先生认为,“中关村”这个地名竟出自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小小失误。

1953年10月,由丘宝剑率队的《中华地理志》编辑部迁进了在中关村的新址,具体地点就是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行政楼。编辑部要联系五湖四海,需要尽快印制一批信封和信笺。那时,这一带只有“保福寺”、“蓝旗营”、“大泥湾”等地名,可是这些地名对于编辑部所在地来说,都不精确。在信封和信笺上印什么地名呢?负责信封信笺印制的是一位姓袁的行政干事,他正在发愁,有人看到离编辑部不远有一个卖杂货的小店,墙上用石灰写着“中官屯”三个大字,就对袁干事说:“就用这个‘中官屯’吧!”可能是袁干事并没有注意到墙上的字,又误把“屯”听成了“村”。就这样,印好的一大批信封上,《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的办公地址就成了“中关村”。也有不少人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还看到过残留下的老土房墙壁上,

用白灰写着“中官邨”三个大字。还有人在现在的中关村第二小学附近看到过一个小小的碑,上也刻着“中官邨”三个字。“邨”是“村”的异体字。照此说法,倒有可能是袁干事只搞错了一个字,把“官”写成了“关”。当时,编辑部本不想用这批信封,一个地理杂志的编辑部,竟把自己的地址都印错了,岂不贻笑大方?可那时“三反五反”运动余波未平,“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那么多信封都毁掉,“浪费”的罪名谁来承担?于是只好将错就错。从此“中关村”这个地名就飞遍了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有时,“错误”会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戏剧家不是就爱用“误会法”制造矛盾和冲突吗?中国民间更有不少乱点鸳鸯却配成良缘,错写一字却传为佳话的故事。当年那个小小的失误,也有这种喜剧效果。科学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可是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有哪个关心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关村”总比“中官屯”或“中官邨”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发生了这样的错误,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科学院逐步扩大,其范围已经扩展到了蓝旗营、保福寺、黄庄等地,“中关村”也就成了一个泛指中国科学院的“概念”,而不再是那个小小的,难以找到原坐标的“中官邨”了。

由此可以看出,“中关村”的地域概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的。至于现在,就连昌平、大兴的部分地区也属于“中关村科技开发区”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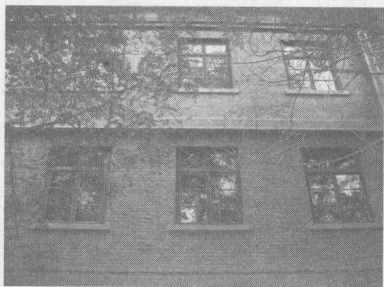


“中关村”石碑

书不是考证中关村历史地理的专著,讲这些闲话无非是提供一点线索,以飨对此有兴趣的读者。

(四)

中关村建起的第一座楼是原子能所的前身——近代物理所的科研楼。与此同时,还建起了一座座灰色的三四层住宅楼,其中就有三座三层的“特级楼”,这是为了体现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而建的,俗称“特楼”。这三座楼的格局像一只展翅北飞的鸿鹄,14楼居中,犹如头部和身体,左有15楼右有13楼,如展开的双翼。



14楼局部



14楼的新、旧楼号牌并存

三座特楼中,14楼房间面积最大,而且厕所和浴室是分开的,互不相扰,它也是三座楼中唯一有木地板的楼。不过,14楼的结构却是三座楼中最差的,进门就是一条通道,房间对称地排列在通道两旁,活像大学生宿舍的“筒子楼”。客人进门,往往会裹足不前,因为不知道应当进哪个房间,也有自信心比较强的见门便入,结果竟走进了厨房。

13楼和15楼是一对孪生姐妹,结构、布局完全一样,比14楼的通道式结构要好,但地面是红色的水泥地。三座楼的厨房都有一个很大的镶着白瓷砖的灶,烧的是煤块,余热可以用来烧水洗澡。厨房和卫生间的灰色水泥地 and 水泥墙上裸露着纵横交错的管道,连现在“经济适用房”的装修都比它们强。虽然如此,在“一穷二白”的年月



14楼一层两家(厨房)后门

里,仅仅那只浴缸就足以证明它是高档住宅了。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把几十个人泡在一个澡塘里洗澡当作享受。

在那个年代,每到夜晚,14楼前都有荷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岗,离三座特楼不远,还驻有一个装备精良的警卫战士班。可见,三座特楼的分量有多重!

(五)

犹如一位天真的村姑要变成一位学识渊博的女学者一样,中关村从“村”转变为“科学城”有一个艰难而又令人振奋的过程。

三座特楼刚刚建成的时候,许多配套设施都还没有建起来。再说,当时中关村正在大兴土木,有些事,有关部门一时也顾不过来,或者根本想不到。三座特楼和周



当年“特楼”安装的木质碗橱

围的一些居民,面临着许多困难,没有商业网点,没有幼儿园和学校,甚至有了急病却没有医院……

要把“家”的事情办好,让科学家们安心地建功立业,光靠领导的关心、女主人的能干还远远不够,更不是有了保姆就万事大吉的。李佩教授当时担任“西郊办公室”副主任,这是当时中科院管理中关村地区的机构。在她组织下,吕叔湘的夫人、赵忠尧的夫人、赵九章的夫人、邓叔群的夫人、梁树权的夫人组成了“家属委员会”,许多有关生活上的事,卫生、学习、安全、子女教育……都由她们担当了起来。这个全部由院士夫人组成的家属委员会可能是中国档次最高的家属委员会了。在西郊办公室和家属委员会的努力下,中关村建起了幼儿园、医务室和中关村地区最早的小学校——保福寺小学,即现在的名气很大的中关村第一小学。那时,中关村没有医院,为解决中关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还建起了一个医务室,不过医生很难找,最后终于请到了一位已经退休的沈大夫。当时他正住在10号楼的女婿家,他的“乘龙快婿”就是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863计划”的四位首倡者之一——陈芳允院士。到了1960年,在科学院的关怀下,又建起了

中关村医院,中关村地区的医疗条件才有了很大改善。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三座特楼周围的环境也大为改观。13楼前栽着一片桃林,每年春天就绽放出红色的重瓣桃花。15楼前是一个苗圃,春天来到时,叶绿花红,一派欣欣向荣景象。60年代初,科学院在张劲夫副院长的号召和亲自带领下,又在中关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绿化活动。过去14楼虽然正对小区大门,却只



郭永怀、杨嘉墀、汪德昭、郭慕孙、
陈家铺等住的13楼2单元